

## 二战后日本军事战略之演进

胡 萍

(空军大连通信士官学校 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 辽宁 大连 116600)

摘要:《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的国防政策和军事发展指针,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及防务的纲领性文件。通过对日本颁布的五部《防卫计划大纲》进行历史性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冷战期间日本对军事战略进行了三次调整,最后确立了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开始对防御性战略进行调整,并以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为契机,确立主动先制的外向型军事战略。

关键词:战后;日本;军事战略;演进

中图分类号:E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15(2015)04-0115-05

### 一、冷战期间,建立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战略

冷战时期,日本奉行的国家战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战略强调守势和对美国的依附,在军备发展上进行自我约束。1976年《防卫计划大纲》提出:日本为应对“有限的、小规模侵略事态”,应建立和保持一支小规模、质量较高的“基础防卫力量”;当超过一定限度时,则请求美国支援。

#### (一) 确立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1. 主动寻求美国的保护。早在1947年,时任日本外相的芦田就指出“我们认为保障日本独立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方面同美国缔结特别协定,以防备第三国的侵略,……由美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这一意见得到了首相吉田茂的赞同。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吉田内阁和美国政府于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署了《对日媾和条约》,同时订立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依靠美国保护,正式成为日本防卫体系的主要支柱,以后的历届政府基本贯彻了这一思想。

2. 谋求日美平等伙伴关系。虽然日本主动寻求美国的保护,但日本并不甘居于被控制地位。随着

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日本开始不断谋求与美国关系的变更。1960年1月,日美签署的《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强调,当日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双方应通过“协商”采取行动,“以应付共同的危险”。从此,日本“由一个受保护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与人共同防卫的国家”<sup>[1](P38-40)]</sup>。1976年《防卫计划大纲》和1978年《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进一步明确了日美作战分工和日美联合作战计划。

3. 扩大日美军事合作范围。1972年,日本从美国手中收回冲绳后,直接防御范围扩大到冲绳及其附近海域,日美军事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得到进一步发展。1984年12月26日,《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联合军事作战计划。中曾根内阁时期,日本不仅参加美国组织的环太平洋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明显增加,而且演习也开始从海空延伸到陆地,美日的军事合作更加密切。1986年9月9日,日本宣布决定参加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把日美军事技术合作发展到外层空间<sup>[2](P36)]</sup>。

#### (二) 不断调整假想敌对国家

日本认为,“如果没有假想敌国,便无法制定防

收稿日期:2015-07-10

作者简介:胡萍,空军大连通信士官学校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讲师、军事学博士。

卫计划”<sup>[1] (P41)</sup>。因此,选择假想敌国,成为日本防卫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1. 将前苏联作为主要假想国。日本在具体分析周边国家情况的基础上认为,“苏联对日本既有侵略能力又有侵略意图”。为此,日本加强了针对前苏联的兵力部署,完成了三个海峡及西太平洋广大海域的对苏监视体制,将“周边海域”的范围由过去的“太平洋一侧 300 海里、九州西方 200 海里、日本海 100 海里和远洋航线 500 海里”改为“周边数百海里和航线 1000 海里”<sup>[4] (P157-162)</sup>。

2. 防范中国和朝鲜。此时,日本也考虑到了对中国和朝鲜的防范,特别是设想如果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发生武装冲突,日本如何与美国协同动作。日本与美国联合制定了以中、朝为主要作战对象设想的“三矢”“天龙”“奔牛”三个作战计划。1969 年,日本更是单方面划定了所谓的“防空识别区”,将东经 123°以东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全部纳入其中<sup>[1] (P44)</sup>。

### (三) 建立高质量的“军事力量”

1. 重建“军事力量”。为使日本成为侵朝美军的可靠后方基地,美国要求日本建立警察预备队。警察预备队的成立为日本自卫队的组建奠定了基础。1954 年 6 月《防卫厅设置法》和《自卫队法》颁布之后,日本以“自卫”的名义正式组建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1957 年,日本《国防基本方针》规定“根据国力、国情,在自卫所必需的限度内逐步发展有效的防卫力量。”这一方针为日本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基本依据,为战后军事战略勾画出了基本轮廓<sup>[3] (P275-278)</sup>。

2. 建设骨干防卫力量。为建立一支“骨干防卫力量”,日本在 1958 年至 1976 年先后执行了四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第一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提出了陆上自卫队 3 年内和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 5 年内的建设目标。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则按照“依据国力和国情”渐进建设的原则,实施第二、第三两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既从内容上充实已有的“骨干防卫力量”,又训练能够打现代战争的指挥官和技术骨干,提高自卫队武器装备现代化、国产化水平,为有效地进行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做好准备<sup>[3] (P278-281)</sup>。

3. 建设基础防卫力量。1976 年《防卫计划大纲》突出质量建设,提出了在“国内外形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军事力量将达到的目标,即对付“小规模侵略事态”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这一构想的基本含义是,平时保持少而精的常备力量,战时则可迅速扩充。在这一时期,日本完成了第四次防卫力量发展计划,武器装备在未增加数量的情况下,现代化程度明显提高<sup>[4] (P141-150)</sup>。

### 二、冷战结束后,对专守防卫战略进行相应调整

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北方威胁”一夜之间消失,其扩充军备的借口也同时随之消失了。这对日本追求地区事务主导权和世界事务的主要参与权是极为“不利”的。1995 年《防卫计划大纲》,扩大了自卫队的职能范围,明确规定其任务除了“保卫日本安全”外,还要应对大规模灾害和为建立更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而在日本以外的地区发挥军事作用。

#### (一) 重新定位日美军事同盟

1. 坚持日美军事同盟,是日本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冷战结束后,日本仍然把坚持日美军事同盟作为本国军事战略的重要支柱,对日美同盟战略重新进行定位。

2. 修改日美合作政策。为增进日本与美国之间业已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明确日美双方在同盟内新的使命和作用,1996 年 7 月,两国修订了 1978 年制定的“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日本获得了同美国在防卫合作中的平等地位。日美军事合作范围将从“日本有事”扩大到共同干预“周边事态”。日美军事合作的内容包括日本向美军干预事态提供基地、各种后勤支援和出动自卫队帮助美军,日美可以自行判定哪些事态属于“周边事态”<sup>[5] (P118-123)</sup>。

3. 确保美军长期驻扎。美军在日本的驻防是日美安保体制的核心。日本认为,驻日美军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日本必须采取多种措施保证美军的顺利驻扎,以谋求提高日美安全同盟的可靠性。一是日本根据本国的财政情况,在地位协定的框架内向美军无偿提供基地和设施,以及劳务援助。二是在不影响安全及部队防护需要的前提下,调整、合并、缩减驻日美军设施,以缓解驻日美军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三是确保驻

日美军稳定使用设施和基地<sup>[5]</sup> (P124-127)。

## (二) 提出威胁对象多元化论

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形势和地区形势的变化,日本认为面临着“多元”威胁,其防卫对象由过去的“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也就是由前苏联转变为朝鲜、中国和俄罗斯。

1. 降低北方威胁判断。冷战刚结束时,俄罗斯开始削减远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但日本并没有放松对俄罗斯的警惕。但随着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活动持续处于低调,日本对来自俄罗斯威胁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1994年、1995年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中虽然仍然认为“俄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与军队发展前景的不透明,是亚太地区安全的不稳定因素”,但没有出现“主要威胁”的提法。1996年后,日本则只是指出“今后远东俄军的去向是不确定的,必须予以关注”。

2. 将朝鲜作为首要威胁。日本认为,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上,朝鲜半岛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联系,是连接日本与欧亚大陆的“陆桥”,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但朝鲜政治不透明,实行军事优先的政治(先军政治),开发核武器,研制远程导弹,“是该地区重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是重大的国际问题”。1993年,朝鲜在日本海进行导弹发射试验,并退出“核不扩散条约”,更是让日本感到朝鲜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是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日本在1994年《防务白皮书》中,将朝鲜视为日本的首要威胁,对其动向必须予以密切关注。

3. 公开将中国作为防范对象。冷战一结束,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日本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综合国力增加,国际地位提高,影响了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领导地位;中国军费增长速度过快,武器装备迅速实现现代化,是东亚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中国海军向远海发展,威胁到日本的海洋利益;等等。于是,1996年《防卫白皮书》首次公开将中国作为防范对象。

## (三) 扩大“军事力量”的影响力

1976年《防卫计划大纲》中,自卫队的任务只是守卫国土,维持社会稳定。但是,1995年《防卫计划大纲》和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则要求,自卫

队要“通过参加国际维持和平活动,谋求国际社会的稳定”,“推进安全对话和防卫交流,增进和周边邻国的信赖关系”,甚至将自卫队的作战区域由“国土”扩展到“周边”甚至更远的区域。

1. 注重开展实战演习。在大多数国家大幅度削减实战演习的大背景下,唯日本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连年举行大规模实战演习。1993年9月29日至10月12日,自卫队举行了战后大规模陆海空综合演练。同时,日本自卫队还经常与美军举行联合演习。仅1993年,日美就举行了16次联合军事演习,累计157天。

2. 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海湾战争后期,在美国对多国部队追加支援的要求下,日本于1991年4月24日将自卫队扫雷艇派往波斯湾地区执行扫雷任务,为冷战后日本海外派自卫队的先例。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通过后,日本又派出自卫队参加柬埔寨和莫桑比克的维和活动。1996年2月开始参与戈兰高地维和行动。1998年则派遣由80名医疗队员与105名航空运输队员组成的自卫队部队,前往洪都拉斯共和国实施飓风救灾活动。

## (四) 加速自卫队的现代化建设

为适应冷战后国际社会裁减军备的潮流,1995年《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了“合理、高效、精干”的建设方针,并基于这一方针对自卫队的定员和装备作适当调整。虽然削减了防卫力量,但由于装备的现代化,自卫队的战斗力反而得到了提升。

1. 适应未来战争需要改革编制体制。根据1995年《防卫计划大纲》,日本对防卫厅和自卫队编制体制进行全面调整。削减陆上自卫队定员,增设快速反应预备役队自卫队员;海上自卫队向则向大型化、高速化发展,提高了主力护卫舰队的战斗力;航空自卫队则提高了主力装备的现代化。成立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情报总部,在强化自身情报能力的同时,还进一步强化与美军的情报合作<sup>[1]</sup> (P282-303)。

2. 大力采购现代化主战装备。根据1995年《防卫计划大纲》,日本制定了《1996—2000年度中期防卫力量建设计划》,增加了军费开支,并重点加强自卫队现代化建设。一方面加大科研开发的投入,不断引进防卫产业研制的国产尖端武器装备;另一方

面则博采众家之长,斥巨资购买世界上第一流的武器装备。

### 三、“9·11”后,建立主动先制的外向型军事战略

“9·11”之后,日本以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出台为契机,拉开了新一轮军事战略调整的帷幕,其军事发展开始向实质性、可操作性方向转型。

#### (一)力促“和平宪法”的修改

国力不断增强的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对‘和平宪法’诸多限制的突破。”“9·11”之后,日本更是加快了“和平宪法”的修改进程。

1. 提高社会各界对修宪的认同。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日本“政治大国化”进程的加快,日本社会各界对自卫队的认同感及关注度明显提高。据2005年《防卫手册》统计,对自卫队表示关注的国民比例达59.4%,较之1981年的49.6%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以认为,日本民意的这一变化为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社会基础<sup>[6] (P22-26)</sup>。

2. 迂回推进修宪进程。日本宪法修订需要满足“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赞成”及“在国民投票中获得半数以上赞成”的条件,但日本大多数民意反对修改宪法。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不断推出新立法的策略,一点点蚕食。“9·11”后,日本相继通过了《海外派兵法》《反恐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支援伊拉克重建特别措施法》《反海盗法》等一系列法案<sup>[7] (P96)</sup>。日本外交评论家佐藤优承认:“日本这样做,实际上是无视宪法的制约,改变了国防政策。”

3. 依靠美国对修宪的支持。日本当局对和平宪法的修改就不可避免地要考虑美国因素。小布什上台后,反复强调美日同盟以及加强美日关系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核心。美国官方公开支持日本修宪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特别是“9·11”后,美国对日本修宪的支持态度鲜明,更是对日本修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终于,2014年7月1日,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sup>[8] (P13-17)</sup>。

#### (二)加快日美军事一体化进程

美国学者肯尼斯·B.派尔曾说“国际舞台上谁独占鳌头,日本就会出于自我利益而跟谁结

盟。”<sup>[9] (P76-89)</sup>“9·11”之后,为配合驻日美军部署的调整,日美两国加紧进行战略层次的磋商,加快了日美军事一体化的进程。

1. 拓宽日美军事合作领域。2006年5月,日美安保磋商委员会会议(即“2+2”会晤)就日美军事一体化建设问题达成协议,决定在导弹防御上加强合作,共建指挥系统及情报共享机制<sup>[10] (P9-13)</sup>。2015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提出,要构建“无缝、强力、弹性、高效”的同盟协调与联合应对机制,这或可视为日美未来军事一体化的总体图景。目前,日美安全合作领域从传统的空中作战、海上作战、反潜作战、反导作战、后勤支援等到太空网空合作,再到装备技术与情报合作,可谓全维立体、无所不包<sup>[11] (P7)</sup>。

2. 放开日美武器装备技术合作。日美装备技术定期协商会议是关于武器装备、军事技术的重要交流管道,其主要任务是就日美两国需要共同研发或改装的具体项目达成协议。2003年5月,日美两国签署了“科学技术人员交流计划”,通过互派军事技术人员加强军事技术交流<sup>[12] (P13-17)</sup>。随着2015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日本今后将会在自主遂行作战行动的需求牵引下,强化与美国在太空、网空和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sup>[10] (P7)</sup>。

3. 加强日美联合军演。日美除“利剑”“利刃”系列年度军演之外,还举行各类作战样式的联合军演。2005年日本首次参加“金色眼镜蛇2005”多边军演。2006年初,日本不远千里赴美国举行“夺岛”联合军演,2月又进行了以我国和朝鲜为假想敌的“利刃2006”图上作业演习<sup>[13] (P52)</sup>。2014年2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美国举行了代号为“铁拳”的年度军事演习。

#### (三)鼓吹“中国威胁论”

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中首次提及“有必要对中国的动向予以关注”。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则突出强调了“中国威胁论”,并提出建立“机动防卫力量”。2013年《防卫计划大纲》则明确显示出转向应对中国的姿态。由此,日本将防卫重点由日本东北转向西南,加强西南诸岛(指日本九州以南、中国台湾岛以东的岛屿,其中就包括钓鱼岛)的防御。同时,重点部署以海空作战力量为主的机动防卫力

量,并强调要与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加强防卫合作,以图达到联合牵制中国的目的。

#### (四) 丰富“军事力量”运用内容

日本不断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扩大自卫队的任务职能,从维和行动、灾害救援、“人类安全保障”直至应对“新型威胁和多种事态”。

1. 参与国际事务。“9·11”之后,日本在联合国框架下海外行动越来越多。2003年2月至2004年6月,日本派680名自卫队队员参与东帝汶维和行动,是其参与维和行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日本还向“联合国驻尼泊尔政治使节团”和“联合国驻苏丹政治使节团”派遣军事监督员。除此之外,日本自卫队还协助联合国难民高级事务署等国际机构,向卢旺达、东帝汶、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的灾民运送各类援助物资<sup>[14] [P13-15]</sup>。

2. 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对日本自卫队而言,每遂行一次任务都是一次远程快速反应能力的训练。2005年初,日本首次同时派遣陆、海、空自卫队前往印度尼西亚周边海域实施地震海啸救灾活动。2007年8月,日本派遣“中央快速反应集团”24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中东戈兰高地实施运输等支援活动。2009年3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涟”号和“五月雨”号两艘驱逐舰开赴索马里海域,为日本商船提供护航<sup>[14] [P13-17]</sup>。

#### (五) 加快提升军事实力步伐

从2013年《防卫计划大纲》可看出,日本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建设。

1. 不断更新现代化武器装备。日本强调,为了适应未来的各种威胁,自卫队必须具有更强的军事实力。早在《2001—2005年度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中,日本就决定投入25.16万亿日元发展“军事力量”,主要经费集中在更新武器装备上,而主要目标是大力发展高技术化、大型化和远程化的先进武器装备。到2020年,日本将拥有更多的先进作战平台,如F-35战斗机、“出云号”护卫舰,以及更加先进的潜艇。

2. 继续进行体制编制调整。从2005年起,日本防卫厅开始了以确立联合作战体制为重点的体制编制调整,以使自卫队拥有更强的机动能力和作战能力。一是改组参联会,设立联合参谋部,把以往各自为政的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的指挥权归并统一,强化了作战指挥体系。二是适应自卫队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将原隶属于参联会的情报本部升格为防卫厅直属。三是继续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为标准,调整作战力量体制编制<sup>[15] [P70-86]</sup>。2007年1月,日本政府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成为日本政府中与外务省、财务省同等的部级单位<sup>[12] [P3-15]</sup>。

#### 参考文献:

- [1]王少普,吴寄南.战后日本防卫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2]何英莺.日本海外派兵问题的由来与发展[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
- [3]王颜昱.日本军事战略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
- [4]米庆,余监修,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 [5]孙成岗.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研究[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 [6]张晓磊.日美声明下的日本修宪战略[J].日本学刊,2012(3).
- [7]管颖,吴琪.日本修宪与宪法第九条问题研究[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 [8]陈卓武.战后日本修宪的态势及其背后的美国因素[J].东南亚研究,2008(6).
- [9]张景全.国际体系与日本对外结盟[J].日本学刊,2005(3).
- [10]杨民军.日本军事力量的八大转型[J].外国军事学术,2008(5).
- [11]袁杨,钱华,邵正平.修订“防卫指针” 美日同盟再度调整[N].解放军报,2015-05-15(7).
- [12]江新风,尤文虎.近年日本军事转型探析[J].日本学刊,2009(1).
- [13]李凡,杨鹏.西太平洋地区军演现状及其对我海上安全的影响[J].日本学刊,2007(1).
- [14]徐万胜.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析论[J].和平与发展,2010(4).
- [15]江新风.日本的军事转型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J].日本学刊,2013(3).

[责任编辑:白礼平]